

魏
源
集



魏
源
集

上
冊

中
華
書
局

魏
源
集

下
冊

中
華
書
局

魏 源 集

(全 二 册)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8 1/2 印張 502 千字

1976 年 3 月第 1 版 197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號：2018·136 定價：2.65 元

前言

魏源(公元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曾任知州、知县等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者和地主阶级的革新派。他生活的六十三年,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行将解体,并开始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急剧转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尖锐,外国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与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联系,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革新与守旧、抵抗与投降、爱国与卖国两条路线的斗争也相当剧烈。魏源一生写有《古微堂集》、《古微堂诗集》、《老子本义》、《孙子集注》、《书古微》、《诗古微》、《元史新编》、《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等主要著作。《魏源集》选录了魏源的短篇论著和诗篇。它反映了魏源坚持爱国和主张革新的主要思想。

一

十九世纪初,英国殖民主义者加紧对外扩张,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为它掠夺的一块肥肉。他们采用贿赂等卑劣手段,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鸦片输入使中国人民受到

严重损害，也给清朝政府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困难。面对着这种情况，中国人民是坚决抵抗，坚持斗争的。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分化为主张抵抗的禁烟派与主张妥协的反禁烟派。反禁烟派代表人物搬出了孔孟的「宽恕」之道，反对给贩卖和吸食鸦片者以严厉制裁，胡说什么严禁鸦片将产生「互讦之风」，造成「死刑太多」，不合「国家教育斯民之道」。他们竭力主张「仍用旧例」，准许鸦片公开输入，让它流毒全国。他们是鸦片走私犯的后台，是英国侵略者在中国的代言人。

魏源是禁烟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痛心他指出：鸦片输入「耗中国之精华，岁千亿计，此漏不塞，虽万物为金，阴阳为炭，不能供尾闾之壑」，（《军储篇》）必将给清政府造成财政危机。他又指出：鸦片「醉我士女如醇醪」，（《江南吟》）毒害着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针对反禁烟派的奇谈怪论，他主张严厉打击顽固的鸦片贩子和坚持不改的鸦片吸食者，做到「惩一儆百，辟以止辟」。（《江南吟》）他说对鸦片流毒放任姑息，势必是「期愈宽，犯愈众」。他怒斥反禁烟派是一伙不顾国家兴亡的民族败类。魏源严禁鸦片的主张在当时是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

一八四〇年，英国悍然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战争爆发以后，反禁烟派的代表人物千方百计为英国侵略中国开脱罪责。他们颠倒是非，诬蔑禁烟派「办事不善」，

「操持过急」；胡说英国发动武装侵略是「因烧其鸦片，挟愤而至」。这伙畏敌如虎的投降主义者被英国侵略者吓得魂飞胆裂，胡说什么英国侵略军是「人众一心，其殊非小弱，且其船只之高大坚厚，炮械之猛烈便利」，有不可战胜的力量；而中国被描写成「船不敌夷人之坚，炮不敌夷人之利，而兵丁胆气怯弱」，根本无法抵抗。他们的结论是：侵略者「船坚炮利」，中国武器不良，抗战必败，极力制造民族投降主义的舆论。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他们不惜对坚持抗战路线的林则徐等「重治其罪」，为侵略者「代伸冤抑」，以裁减沿海兵力表示投降诚意，打着孔孟「礼」、「信」、「义」的破旗同侵略者谈判，乞求敌人退兵。他们声言对侵略者「必先由我示以大信大义」，「晓以礼义」，「详细开导」，使它「有愧悔之心」，他们竭力散布侵略者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幻想。这是地地道道的骗人鬼话，不折不扣的投降卖国哲学。

在英国对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后，魏源坚决主张抵抗侵略。他亲自参加过抗击侵略军的战斗，坚决支持林则徐等抵抗派的正义斗争，给投降派以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他针对投降派歪曲鸦片战争原因的谬论，指出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绝不由缴烟」，也不是因为抵抗派「操持过急」，而是由英国侵略者「唯利是图」的本性所决定的，因此，中国必须加强自己的力量。他列举鸦片战争中胜利和失利两方面的生动事实，以及友邻国家在反对外

国殖民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批驳了抵抗必败的投降主义论调。他指出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是清朝大官僚的腐败无能、妥协投降。他以愤慨的心情写道：「城上旌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声。」（《寰海》）他揭穿了投降派「一切力反前任（林则徐）所为」是为了博「得外洋欢心」（《道光洋艘征抚记上》）的卖国主义实质。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选集》第五九五页）英国殖民主义者向中国发动侵略之日，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侵略之时。沿海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奋战，使侵略军寸步难行，狼狽不堪，特别是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在如何对待人民群众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斗争这个问题上，抵抗派与投降派持有不同的态度。投降派在侵略者面前畏敌如虎，对人民群众则是凶狠如狼。他们咒骂坚持反侵略斗争的人民群众为「顽民」、「奸民」，诬蔑广东省「汉奸遍野」，叫嚣「患不在外而在内」，提出一条「防民甚于防寇」的镇压人民、不许抗战的投降主义方针。

与投降派的态度不同，抵抗派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群众反侵略的力量。林则徐提出「民心可用」，组织团练，抗击侵略者。魏源认为「义民可用」，满怀激情地写下这样的诗句：「同仇敌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寰海》）

热情歌颂了三元里人民英勇抗战，严惩侵略者的大无畏精神，愤怒声讨了在敌人面前奴颜媚骨的投降派为侵略军解围的可耻行径。他谴责投降派「化良民为奸民」，「诬义民为顽民」，（《道光洋艘征抚记》下）严重挫伤了人民的抗战锐气。历史证明：「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问将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三一九页）一八四〇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方面正是由于清政府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而导致反侵略的民族正义战争的失败。从此，中国开始一步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鸦片战争后，魏源目睹侵略者践踏祖国大好河山，造成「火光赤如血」、「涛色黯如墨」、「沉沉万家哭」的悲惨情景，眼看侵略军穷凶极恶，「争饮捷胜酒」，（《金焦行》）猖狂肆虐，而清政府仍然苟且偷安、文恬武嬉，毫无发愤图强之意，梦想不平等条约一订立就可「一劳永逸」、「永杜兵萌」。这就更加激起他爱国主义的义愤。魏源不禁发出「曾闻兵革话承平，几见承平话战争」的感叹。（《寰海后》）他总结了鸦片战争失败的沉痛教训，发挥了「于安思危，于治思乱」（《默觚·学篇·七》）的思想，提出「整旅补亡羊」（《寰海后》）的主张，认为不平等条约签订后的中国「武备当振」，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叙》）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制造新式武器，加强国防力量，准备战胜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侵略。同备战主张相联系的，魏源还有积粮备荒的思想。他说「救荒不如备荒，备荒莫如急农时」，

（《吳农备荒议》上）如果有了富裕的积粮，「何虞有警无备」。（《城守篇》）魏源提倡「师夷长技」的目的，是为了「制夷」。这是一种抵抗侵略的爱国主张。

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国近现代史上，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一直存在着抵抗与投降、爱国与卖国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中国人民始终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前赴后继，英勇斗争，表现出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正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使得帝国主义永远不能灭亡中国。而从道光、琦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汪精卫、蒋介石到刘少奇、林彪一类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是一脉相承，对外都是搞民族投降主义的卖国贼。

二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性更加暴露。面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的社会现实，要不要前进？要不要改革？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又是因循守旧、反对革新的顽固派；而抵抗派的主要人物则是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革新派。魏源就是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一个著名代表人物。

鸦片战争前后，魏源对清朝统治的某些腐朽黑暗的现象作了揭露。他指出：掌管漕运的大小官吏中饱私囊，层层盘剥，「漕费之大」「日甚一日」，（《钱漕更弊议》）苛捐杂税的「新旧款目多如麻」，盐政成为官僚商人营私舞弊、剥削农民的罪恶渊薮；水利失修，给农民生命和农业生产带来极大威胁，造成农民「与水争堤若争命」，他们是「日日望禾长，禾长水亦长；日日望禾不高，禾高水亦高」，（《江南吟》）资本主义国家的鸦片大量输入，白银源源外流，银价迅猛高涨。这一切沉重的负担都落在农民身上，把农民推到饥饿和死亡线上。可是，把持朝政要职的大官僚却只知道高官厚禄、因循守旧，而不顾国家兴衰、人民死生。魏源尖锐地指出：他们「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以养痈貽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默觚·治篇》十二）同这伙顽固派官僚相反，魏源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观点。他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主张对清朝的某些弊政实行改革。鸦片战争前后，魏源提出了一些改革水利、漕运、盐政等的方案和措施。从本集《筹河篇》以下的一组文章以及若干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源在这方面的思想和主张。当然，魏源对于漕运、盐政、水利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在所谓「兴利除弊」的思想指导下，企图通过这些具体改革，使衰败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衰而复振，这些枝节的改良，当然不可能挽救封建制

度的灭亡；魏源开出的这些药方，当然医治不了病入膏肓的封建社会的病根。但是，在当时「万马齐瘖」，因循守旧恶浊政治空气的弥漫之下，魏源敢于对当时的「弊政」进行揭露，抨击封建统治的腐败和黑暗，这仍然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是放眼世界，吸收新式的生产技术，还是死守旧章，拒绝一切新事物？这是鸦片战争后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另一个问题。顽固派视新式生产技术如洪水猛兽，称其为「奇技淫巧」，骂其曰「坏我人心」，把「师夷长技」说成「糜费」，把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看作「多事」。这伙顽固派愚蠢到「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都中吟》）的地步。他们昏庸透顶，平时只知道对人民搜括压榨，作威作福，根本不了解敌人的情况和世界形势，一旦外国侵略者兵临城下，他们就茫然不知所措。

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对顽固派把学习先进技术、发展新式工业称为「奇技淫巧」「坏我人心」的谬论进行了有力批驳。他指出：对中国「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他强调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是要「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除了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军事生产技术外，还包括发展「有益民用」的新式工业的内容。他满怀民族自豪感地回顾历史：「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历算则日月薄蚀，闰余消息，不爽秒毫；仪器则钟表晷刻，不亚西土；至罗鍼、壶漏，则创自中国

而后西行。」中国又自有各种人材和充足的资源。他相信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掌握新式的生产技术，可以做到「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海国图志》）以臻富国强兵。毛主席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毛泽东选集》第九八一页）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魏源发展民族工业、巩固国防的梦想只能归于幻灭。然而，一百多年前，魏源批判顽固派因循守旧的思想，主张了解外国情况，发展新式工业，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很可贵的。

魏源对清朝军队的腐败现象也有深刻的揭露。他指出清政府耗费大量的军事开支，号称养兵数十万，实际上「不得一半之用」。（《军储篇·一》）这伙投降派将领贪生怕死，正如抵抗派将领裕谦所指出的：他们在侵略军面前「竟不战不守，纷纷溃散，各顾身家，城池既失，而将备弁兵无一伤亡之人。」魏源反对「贵以袭贵，贱以袭贱」的用人路线，主张实行「量能而授之职」（《默觚·治篇·九》）的用人路线。他认为要改革清朝军队，首先要撤换贪生怕死、不懂打仗的将领，必须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增加武试，增设水师等。他主张「凡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海国图志》）这表明魏源对传统的科举取

士方法开始发生了怀疑。

在魏源的思想中，有明显的尊法反儒的倾向。他对儒家思想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他对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奉为儒家经典的《六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后世尊之为经”的《六经》，不过是“一代诗文之汇选，本朝前朝之文献而已”。（《国朝古文类钞》）魏源十分鄙视因循守旧的孔孟之徒，称之为「庸儒」、「腐儒」，怒斥「庸儒」「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默觚·治篇》五）「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默觚·学篇》一）魏源对宋朝理学进行了严厉抨击，揭露「宋儒专言三代」，而他认为「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默觚·治篇》五）魏源极力反对乾嘉以来盛行的汉学。他指出这些钻研汉学的孔孟之徒争治诂训，追求书艺工敏、声律骈偶巧丽，根本「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明代食兵二政录叙》）正是这种学风，「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武进李中著先生传》）魏源努力提倡「经世致用」，主张研究古书要理解它的意义，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魏源提倡的这种学风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有着重要影响。

魏源对历史上某些法家和进步思想家十分崇尚。他赞扬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改变了封建王朝中央无法控制边远地区的状况，而使「关塞险要，尽属王朝」，肯定了「郡县优乎封建」。《默觚·治篇》三）他把废封建、设郡县列为「后世之事，胜于三代者三大端」

之一。（《默觚·治篇》九）他十分赞赏唐代柳宗元颂扬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丰功伟绩的著名文章——《封建论》。与全盘否定和恶毒攻击秦始皇的历代儒家相反，魏源在谈论秦始皇的功过时认为，秦始皇是「罪在一时，功在万世」。（《默觚·治篇》三）他肯定汉高祖刘邦重用陈平、张良等执行法家路线所取得的成就。「伟哉孟德千古雄」，（《观往吟》）这是魏源对曹操的高度评价。他对「孔明（诸葛亮）用申韩」路线实现治安，尤为欣赏。（《观往吟》）魏源还热情歌颂了清朝康熙皇帝平定叛乱，使我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统一、巩固的历史业绩。魏源肯定历史上某些法家和进步思想家的进步思想和进步措施，实际上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和反动政治路线的怀疑和否定，也是为实现他自己的进步政治主张寻找历史根据。

三

哲学上的斗争是社会上政治斗争的反映。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魏源坚持革新、爱国的政治路线，是同他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倾向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相联系的。

人的知识、才能是天生固有的，还是从后天实践中来的？这历来是哲学上两条路线斗

爭的一个焦点。孔孟鼓吹的「生而知之」和「上智下愚」的唯心论的先验论，长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前进。魏源为了推行自己抵抗外国侵略、改革社会现实的政治路线，在「知」和「行」的关系上，他强调「行」对人们认识的重要性。他指出：人们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默觚·学篇》二）他认为人们要了解事物，就必须亲自与它接触。他举例说：看了五岳地图的人，以为了解了山，却不如上山打柴的人走一趟知道得更清楚；听人谈论浩瀚大海的人，以为知道了海了，实际上不如出海经商的人看一眼知道得更确切；浏览了详细名菜谱的人，以为知道了菜味，然而还不如厨师尝一口更了解这种名菜的滋味。（见《默觚·学篇》二）被反动阶级捧为「圣人」的孔老二自称「生而知之」，魏源以讥讽的口吻反问道：如果他是「生而知之」的，那么他还要发愤忘食地钻研周礼，还企望多活几年来学习《易经》干什么呢？这就戳穿了这个「圣人」的画皮。魏源认为「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默觚·治篇》一）他以「敏者与鲁者共学，敏不获而鲁反获之；敏者日鲁，鲁者日敏」（《默觚·学篇》一）这个生动的例子，说明不存在天生的聪明人与天生的愚蠢的人。魏源强调后天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性，当然他所说的「行」还只局限于个人的体验，他并不了解「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二五九页）因而他在「知」和「行」即认识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观点，

还是属于朴素的唯物主义性质的。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倾向，正是魏源比较能够正视社会现实，反对顽固守旧、盲目自大，提倡「译夷书」、「悉夷情」，要求进行某些改革的思想基础。

世间的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还是静止不变的？这是哲学上两条路线长期斗争的另一个焦点。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一直被反动统治阶级所拥护。他们鼓吹一切事物都是静止不变的，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反对社会变革，维护封建统治。魏源以朴素的辩证法为武器，向儒家的形而上学开火。他说：「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有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如阴阳、寒暑、昼夜等是相反的，然而「相反适以相成」。（《默觚·学篇》十一）魏源不仅认为事物是相反相成的，而且看到事物可以向自己相反的方面变化，例如「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信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决」，「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快意之事，忤意之所乘」（《默觚·学篇》七等），都是事物向自己相反方面变化的现象。魏源运用这种变化的观点解释社会历史，产生了历史进化论观点。他认为社会也是要变化的。他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默觚·治篇》五）他断言「后世之事」可以「胜于三代」。在他看来事物是要变化的，历代统治也「断无百载不更弦」（《秋兴》）之